

# 论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人文精神

刘 敏

(四川师范大学 艺术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注重教育的超越性是蔡元培教育理念的基础,它提倡教育应该追求宇宙人生的根本智慧,思考人之为人的精神。在此前提下,蔡元培提出了教育要独立于政党、教派之外,以“五育并举”的方法培养健全的人格,发展人的自由个性。

**关键词:**蔡元培;教育思想;超越;独立;个性;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G40-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1)02-0064-06

在中国教育史上,蔡元培的重要地位早已确立。他的重要性首先在于他以中华民国教育总长、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校长的身份,提出新的教育理念、改革教育制度、兴办平民教育、改造北京大学,开始了中国真正的现代教育,为新文化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同时,蔡元培教育思想中的人文精神,是现代教育区别于传统教育的根本标志,也是我们今天反思教育、进行教育改革不能忽视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蔡元培所在的 20 世纪初,正是中国教育史上风云际会的时候,之前有王国维所谓的“无用之学”,有章太炎提倡的“私学”,也有康有为、梁启超力主的废科举、兴学校。他们或是主张沿袭传统或是主张吸收西学,都是在试图通过改革教育,寻找到救国兴邦的路子。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其现实目的与他们相同,却更重视人的因素,浸润着很深的人文精神,这具体体现在他明确提出的教

育的超越本质,主张教育独立,以培养完满人性为教育的功能和提倡教育要重视发展个性等思想上。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教育反思中,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被常常论及,蔡元培以艺术教育为培养健全人格的手段,提出“五育并举”的思想,成为现代美育的先驱。这里,我以为有必要清理一下蔡元培美育思想产生的思想基础。

1906 年到 1911 年,蔡元培曾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欧洲艺术和西洋哲学,尤其对叔本华、康德的哲学美学服膺,这成为他分析问题的立足点。蔡元培认为宇宙的本体是意志,意志是宇宙和人生的根本动力,并以这

收稿日期:2000-03-22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重点课题“西南地区高师本科学生文化素质的研究与实践”(项目批号:JS008A)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刘敏(1966—),女,四川德阳人,四川师范大学艺术学院讲师,文学硕士。

种观点作为新的人生态度的理论依据。教育的目的也在于寻找这种根本的意志：“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1]（《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第3页）这是蔡元培对于教育本质的根本认识。他认为教育不是为具体的现实服务，在具体的知识传授、技能培养之外，教育还应该有更高层次的目的，即探索永恒、深邃的精神世界，这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因此他说：“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为将来。”[1]（《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第16页）“教育是求远效的。”[1]（《教育独立议》，第377页）“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的。”（《邀范源濂任教育部次长的谈话》，第8页）他认为教师和学生的职责都在研究学问，这学问是对于宇宙人生的根本探寻，而不应该汲汲于功利的回报。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甫上任，万事待兴，他将厘清思想、确立新的教育理念放在首位。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即谆谆告诫：“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晚清以来，很多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教育改革的重要，并开始兴办西式的学校。但当时新式教育每前进一步，都是现实的直接促进。先是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逃到热河，然后有同文馆的兴办；甲午战败，京师大学堂的动议才付诸实践。这种基于现实的、直接的考虑的教育改革，都没有长远的文化考虑。蔡元培教育思想与他们的根本区别，是他提出了教育的超越本质。教育的超越性，使它有可能脱离功利的束缚，在更根本的意义上和更高的层面上有于现实。

需要追问的是，蔡元培明确阐明了教育的超越性，说明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制造合格的党员、官员、工人、商人，那么，他所认可的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什么？也就是说，在操作的层面上，教育将做些什么？这即是他多次提到的培养“健全的人格”。1920年，蔡元培在湖南教育会的讲演中对比教育与科举的差别，无不欣慰地说到五四以前的学生，“全不打算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和人类社会有何关系”。而五四以后“学生顿然了解自

己的责任，知道自己在人类社会占何种位置，因而觉得自身应该尊重，于现在及将来应如何打算，一变前此荒唐暴弃的习惯，而发生一种向前进取、开拓自己运命的心”[1]（《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第254页）。可见，蔡元培所主张的教育，是以人为中心的教育，教育要培养人的智慧，发扬人性，完善人，其目的是人，不是人力。1912年，在中华民国的第一次中央教育会议上，上任不久的蔡元培声明：“民国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着想，有如何能力，方能尽如何责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教育）须立于国民之地位，而体验其在世界、在社会有何等责任，应受何等教育。”[1]（《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第15页）“教育帮助被教育的人格，给他以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中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1]（《教育独立议》，第377页）。所谓健全的人格，即是人的整体的精神素质，人的全面、自由和充分的发展。这与人本主义的教育观是一致的：“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创造最好的条件促使每个人达到他所能及的最佳状态，帮助个体发现与他的真正自我更相协调的学习内容与方法，提供一种良好的促进学习和成长的气氛。”[2]（第355页）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蔡元培提出了他著名的“五育并举”说。

蔡元培所谓“五育”，曰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此五育的全面发展，即形成健全的人格。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蔡元培对于五育的功能、五育之间的关系作了详细的分析。世界观教育是人类的终极关怀：“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桎其心，而惟时时悬一无方体无始终之世界观以为鹄。”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道德教育是作为于现象世界的教育：“军国民、实利两主义，所以补自卫自存之力之不足。道德教育，则所以使之互相卫互相存。皆所以泯营求而忘人我者也。”而教育应“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其达于实体观念之作用。”故而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道德教育的功能在于“由是而进以提撕实体观念之教育”。也同样是追求“实体世

界之观念”,蔡元培提出了美感教育。

在蔡元培看来,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的差别在于,现象世界的事物有千差万别的殊相,人的种种幸福营求,而实体世界则是绝对的永恒的。要由这殊异的相对的现象世界进入永恒的绝对的实体世界,就必须借助美感的作用:“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因为“凡人皆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随离合生死、祸福利害之现象而流转。至美术则即以此等现象为材料,而能使对之者,自美感之外,一无杂念。例如采莲煮豆,饮食之事也,而一入诗歌,则别成兴趣。火山赤舌,大风破舟,可骇可怖之景也,而一入图画,则转堪展玩。是则对于现象世界,无厌弃而亦无执著也。人既脱离一切现象世界之相对情感,而为浑然之美感,则即所谓与造物为友,而已接触于实体世界之观念矣。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1](《教育独立议》,377页)这样的美育观点,是直接由康德的美的普遍性超越性化脱而来。由此可以看出,蔡元培提倡美育的目的,仍然在于引导人们对于非实利的精神价值的关注,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追问,以及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和关怀,“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能尽一分子的责任”[1](《教育独立议》,377页)。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世界观教育不再作为口号提出,但强调教育要有终极关怀,要以培养健全的人格为目标,重视人文精神的传递,是蔡元培始终不渝的思想。

## 二

既然教育不是为现实的政党、商业、利益服务的,那么,在现实关系中教育理所当然地应该具有超然的地位,这就是蔡元培的教育独立观。

1922年,蔡元培发表《教育独立议》,明确表明自己的教育独立观点。他认为教育应当独立于政党和教会之外:“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教育与政党有着根本不同的目的,教育以培养健全的人格、帮助人健康快乐地生活为宗旨,

关注的是普通的人性,而政党则以一党的现实利益为目的,因此“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以远效与近功、终极关怀与现世利益为界,蔡元培在教育与政党之间划了一道分明的界线。同样地,教育的不断追问、关注人性的特点也与宗教相左:“教育是进步的:凡是学术,总是后胜于前,因为后人凭着前人成绩,更加一番功夫自然更进一步。教会是保守的,无论什么样尊重科学一到《圣经》的成语,便绝对不许批评,便是加了一个限制。教育是共同的:英国的学生,可以读阿拉伯人所作的文学;印度的学生,可以用德国人所造的仪器,都没有什么界限。教会是差别的:基督教与回教不同;回教又与佛教不同。”教育非关政党,非关宗教,关心的仅仅是人本身。这是蔡元培反思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病,吸收西方教育思想的人文精神后,对于教育的一种理想的憧憬,也是他在中国兴办新式教育、投身教育改革十余年后的理性思考。

1922年,蔡元培已经担任过中华民国教育总长,任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校长也五年有余。这段时期,是他在努力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的时期,也是他的教育理念在现实中屡屡受挫的时期。教育独立的可能性,是依托于社会力量的多元化。如果政府是社会上唯一强大的力量,那么政府一定不会容许教育的非官方品质。而蔡元培当时面对的,却正是一个集权和专制的国家,因此,在他的教育家生涯中,出现了不断辞职不断任职这一现象。1912年7月,辞去教育总长职务;1919年5月,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1922年1月,再次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1928年,辞去政治会议委员、大学院院长等职务。1919年6月,蔡元培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态度颇为沉痛:“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这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教育思想与北洋政府的冲突。他是在以辞职这种不得已的方式,来维护自己教育理念的纯洁性。在

一个专制集权的国家,坚持并践履教育独立理念,必然是一个斗争、妥协,妥协、斗争的过程。当政府对教育的干涉太过分,蔡元培就以辞职来抗议,当控制有所减弱的时候,又复职,这或许就是蔡元培所谓的“行为不能极端自由,而信仰不可不自由”[1](《在清华学校高等科之演说词》,第82页)。

思想自由是蔡元培先生教育独立观的重要内容。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第72页)“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1](《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第163页)这里所谓的学问,是对自己所处世界的真切认识,是对人之为人的彻底追问,是有关宇宙人生的大智慧大知识,它是超越现实的功利、党派的纷争、宗教的局限的“学”,而非现实层面的“术”。蔡元培认为“学”与“术”是处于不同层面的东西:“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趋旨不同。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目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亦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所经验,促其学术进步。”[1](《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第136页)教育以追求大智慧大知识即“学”为根本目的,那么它必须具有自由的身份,即使它在现实关系中不得不接受种种束缚,在学理上也必须是无拘无束的。

蔡元培是这样分析现实的束缚与理想的自由的关系的:“行为之标准,根于习惯;习惯之中,往往有并无善恶是非之可言,而社交上不能不率行之者。苟无必不可行之理由,而故与违反,则将受多数人无谓之嫌忌,而我固有之目的,将因之而不得达。故入境问禁,入国问俗,不能不有所迁就。此行为之不能极端自由也。若夫信仰则属吾心,与他人毫无影响,初无迁就之必要。昔之宗教,本初民神话创造万物末日审判诸说,不合科学,在今日信者盖寡。而所谓与科学不相冲突之信仰则不过玄学问题之一假定答语。不得此答语,则此问题终梗于吾心而不快,吾又穷思冥索而不得,则且于宗教哲学之中,择吾所契合之答语,以相慰藉

焉。”[1](《在清华学校高等科之演说词》,第82页)这里,蔡元培仍然将现实关系中的行为与形而上的精神探索一分为二,并将思想自由作为精神探索的最高原则。在这个最高原则指导下,他将大学定性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1](《德国分科学之说明》,第174页)以至于他所执掌的北京大学各种学术流派、学术社团风起云涌,哲学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并存,文学上白话文与文言文同在,维新派与保守派并置,成为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蔡元培曾言:“谓教育家最重要的责任,就在创造文化。”[1](《在檀香山华侨招待太平洋教育会议各国代表宴会上演说词》,第350页)北大各种学术思潮团体蔚为壮观的意义或许并不止于教育史,因为这些被谆谆告诫要有终极关怀、要探寻宇宙人生根本意志的莘莘学子,不仅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而且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影响了整个新文化的格局。我们应该承认这样的逻辑:没有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就没有新北大,没有新北大,就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冯友兰说蔡元培“不仅改造了北大,而且开创了新文化运动”[3](第53页)。是为至论。

### 三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可以说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观念。应该注意的是,他所谓的人,不是普遍的、概念的人,而是有情感、有生命、有性格的个体生命。

蔡元培在提出“健全的人格”同时,规定了它的含义:“所谓健全人格,分为德育、体育、智育、美育四项。”[1](《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与社会演说词》,第265页)也就是说,他所强调的是完整的人性。任何教育模式都是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前提,人性观决定教育观、学习观。蔡元培以西方心理学的知、情、意为基础,明确教育以发展完整的人性为目标,这中间包含着对传统教育模式忽视人的个性的批判和对西方技术理性至上的教育模式的反思,有着深刻的人文精神:“把一个人在体力、智力、情绪、伦理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使其成为一个完善的人,这就是对教育目的一个广义

的界说。……它一直是各个时代的人道主义思潮的一个根本主题。”[4](第 213 页)“健全的人格”首先是对传统教育模式的批判。蔡元培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忽视人的主体性,是培养工具的教育而不是培养人的教育:“旧日教育,在与普通人以一种零星之知识,造成国民政府应用之器具;不与以综合之观念,是政治家利用之弊。”[1](《知识问题——在檀香山中国学生会演说词》,第 351 页)“健全的人格”也显示出对西方技术理性分割人的整体性的反思。在技术至上的思维中,人的整体特质被忽视,人被分门别类地当作一件件东西对待,化学把人视为遗传的分子机器,生物学视人无异于动物,心理学则把人归结为大脑的运作,而蔡元培认为学习是在人的主动性支配下的全面的、整体的学习,必须把握各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他很反对将各学科的界限分得太分明,主张文理科的融合渗透。1918 年,傅斯年给蔡元培去信,提出哲学归于文科不当,蔡元培在傅函上作按语:“治哲学者,不能不根据科学,即文学、史学,亦莫不然。不特文学、史学近皆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文学必须根据于心理学及美学等,今之实验心理学及实验美学,皆可属于理科者也。如哲学可并入理科,则文、史亦然。如以理科之名,仅足为自然科学之代表,不足以包文学,则哲学之玄学,亦决非理科所能包也。至于分设文、哲、理三科,则彼此错综之处更多。以上两法,似皆不如破除文、理两科之界限,而合组为大学本科之为适当也。”[1](第 164 页)甚至在他所倡导的“五育”之间,也是互相渗透的:“历史、地理,实利主义也。其所叙述,得并存各主义。历史之英雄,地理之险要,军国主义也;记美术家及美术沿革,写各地风景及出艺术品,美育也;记圣贤,述风俗,德育也;因历史之有时期,而推之于无始终,因地理之有涯矣,而推之于无方体,及夫烈士、哲人、宗教家之故事及遗迹,皆可以为世界观之导线也。算学,实利主义也,而数为纯然抽象者。希腊人毕达哥拉士以数为万物之源,亦是世界观之一方面;而几何学各种线体,可以资美育。”[1](《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第 6 页)要在内容各别的学科中发现联系,首先要将这各类的知识视为一个整体,这整体事实上就是对于人所处的世界、人自身的生存状况的

关切与同情,这也是现代教育的根本目的。

在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上,蔡元培的观点也显示出明显的人文倾向。人文主义教育家坚持教育就是要使人成其为人,其根本目的在于个人而不是社会。尽管它并不拒绝教育的社会目的,但它认为“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社会价值要由个人价值来体现,社会的完善是由个人的完善所决定的。因此,教育必须以培育理想的人性为主要目的,只有这样,才能造成一个理想的社会。”[5](第 7 页)。蔡元培也是在个性与共性协调的前提下,注重个性的发展,并将个性的充分发展视为高境界的标志。他说:“因而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1](《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第 155 页)他在对清华学生的讲演中,对学生的希望第一点就是发展个性:“分工之理,在以己之长,补人之所短,而人之所长,亦还以补我之所短。故人类分子,决不当尽归于同化,而贵在各能发达其特性。吾国学生游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所谓特性,即地理、历史、家庭、社会所影响于人之性质是也。学者言进化最高级为各具我性,次则各具个性,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1](《在清华学校高等科之演说词》,第 81 页)当时乃西风正热之际,蔡元培对文化交流持这样的态度,确是教育家的远见卓识。读书与救国,是当时一个很尖锐的现实问题(事实上,90 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广场”与“岗位”之争,仍是这一问题的延续),蔡元培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以人的完善与发展为立足点,而将救国与改良现实作为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的教育的现实功能问题。他主张通过完善国民素质来达到整个社会的进步,他说:“革命者即治病之方药也。上海之革命团,名中国教育会。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根本。则欲副爱国之名称,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而在养成完全之人格。盖国民而无完全人格,欲国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虑焉。造成完全人格,使国家隆盛而不衰亡,真所谓爱国矣。”[1](《在爱国女校之演说》,第 75 页)他还告诫学生:“我很希望诸位如今在学校里,能努力研究

学术,格外穷理。因为能在学校里多用一点功夫,即为国家将来能多办一件事体。”“要解决问题,先要研究问题。”[1](《读书与救国》,第513页)因此,当五四以后,他不得不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时,在天津火车站发表谈话称:“我将先回故乡,视舍弟,并觅一幽僻处,杜门谢客,温习德、法文,并学英语,以一半日力译最详明之西洋美术史一

部,最著名之美学若干部,此即我此后报国之道也。我以为吾国之患,固在政府之腐败与政客军人之推辞捣乱,而其根本,则在于大多数人皆汲汲于近功近利,而无高尚之思想,惟提倡美育足以育之。”[1](《在天津火车站南下时的谈话》,第217页)当他的教育理念无法推行时,就只能退而以知识分子的立场来报效祖国了。

#### 参考文献:

- [1]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2]王森洋,张金华.当代西方思潮词典[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3]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M].上海师大外国教育研究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5]扈中平,刘朝晖.挑战与应答[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

## On Humanism in Cai Yuanpei's Pedagogy Ideology

LIU Min

(Institute of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Stress on educational transcendence is the basis of Cai Yuanpei's pedagogy idea, which advocates education seeking for fundamental wisdom of universal life, and meditating upon humanism. On this prerequisite, Cai puts forward that education must be independent from political parties or sects, cultivate healthy personality with "wu yu" approach, and develop free individuality.

**Key words:** Cai Yuanpei; pedagogy ideology; transcendence; independence; individuality; humanism

[责任编辑:王永政]